



外资并购与中国经济福利

A framework and model of evaluating the
compact of cross-board M&A on Chinese
economic welfare

— 高伟凯
徐力行 / 著 —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外资并购与中国经济福利

A framework and model of evaluating the
compact of cross-board M&A on Chinese
economic welfare

高伟凯 徐力行/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资并购与中国经济福利/高伟凯,徐力行著.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5

ISBN 978-7-5096-0952-1

I. ①外… II. ①高…②徐… III. ①外资公司—企业合并—研究—中国 IV. ①F279.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5075 号

出版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010)51915602 邮编:100038

印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陈 力

责任编辑:陈 力 韩冰曦

技术编辑:杨国强

责任校对:超 凡

720mm×1000mm/16

14.25 印张 218 千字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书号:ISBN 978-7-5096-0952-1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010)68022974

邮编:100836

序 言

近 20 年来，国际直接投资（FDI）非常活跃，其年均增长率超过 12%，远远超过世界 GDP 的增长速度，而其中 70% 以上是以跨国并购的形式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范围内的跨国并购已经可以成为 FDI 的代名词。2007 年以后，世界金融危机虽然减缓了国际跨国并购的增长步伐，但从跨国并购的历年数据来看，其总体的快速增长趋势和在世界直接投资的主导地位不会发生根本变化。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逐渐走稳和回暖，国际直接投资会迅速升温，与之相伴的必然是跨国并购浪潮的卷土重来。

中国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多是以合资的形式出现的，稍有规模的外资在华并购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其占世界范围内跨国并购总额的比例在 2004 年巅峰时也不过 1.78%，在流入中国的 FDI 中比例也并不大——2007 年达到顶峰时也不过 18.6%，这相对于其前期高点 1999 年的 6% 水平虽已经有了大幅增长，但毕竟绝对比例仍与世界平均水平有着很大的差距。然而，外资在华并购的领域却越来越向垄断性行业、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集中，且并购的规模之大、系统性之强，已经远远超出企业级并购的水平，而上升到产业级并购的高度。如果把外资并购的绝对金额作为外资在华并购的量，把外资实现其并购目的而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度作为外资在华并购的质，那么单纯从质和量的不同视角看，会在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的福利影响方面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结果：从量上看，外资并购占 FDI 的比例很低，因此有理由推断外资并购并未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负面福利影响；从质上看，由于外资并购集中发生在当前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部门，这无疑对中国产业和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或现实的威胁。因此，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也具有了不同的政策含义和要求：前者认为外资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仍然主要体现为一般 FDI 对东道国经济



的影响方面,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来看,这一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因此无需对其采取过多特殊化的政策干预,即使有干预也应该是一事一议,个案处理;后者认为外资并购的重点明了、危害清晰,因此中国急需对外资并购采取更为系统化的限制性措施。中国到底对外资并购是抑还是扬,取决于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福利影响的综合判断。遗憾的是,现有这方面的文献或者仅限于定性分析,或者基于还原论的视角,而缺乏系统论视角的定量研究。由高伟凯博士和徐力行博士完成的《外资并购与中国经济福利》一书在这方面则做出了开创性的尝试,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福利影响的评估框架和模型研究”的重要成果,综合看来,我认为该研究体现了如下四方面特色:

第一,研究方法和领域上有突破。当前跨国并购的效应研究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企业层次,通过研究跨国并购后企业的价值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来评判跨国并购的效果;二是产业或区域层次,通过考察跨国并购的宏观效应,来说明其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这些宏观效应的研究文献大多是从就业、工资、税收、进出口、技术进步等方面入手的还原论分析,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论证往往只限于定性层面,定量的系统论研究高度缺乏,而本书则是这方面富有开创性的尝试。它通过建立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CGE)的模型,将多方面因素融入一个系统分析框架下,一方面,有效地避免了还原论分析不能兼收并蓄的缺陷;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分析结果的量化,对政策制定的准确性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实际上,CGE模型已经被广泛使用于测量税收变化、环境保护、国际贸易对一国福利影响等方面,但在跨国并购的福利影响方面恰恰还是空白,因此,本书对CGE理论和方法运用领域的拓展也是有贡献的。

第二,研究的思路上有创新性。与很多现有同类选题的研究思路不同的是,本书所体现出的研究主线是立足于一国长期竞争力的。综观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的分析,也不论其根本出发点是否蕴含了对一国竞争力的考量,但其实证模型中,并未把国家或产业竞争力的衡量融入其中。而本书则通过采用两段式的处理方法——用CGE去模拟外资并购引起的多变量变化,再通过构建包含多变量的竞争力指标,实现了对外资并购造成的中国产业竞争力变化的衡量。由于各模型或指标的专长或指向往往有很大差



异,要充分调和这种矛盾或者不可能,或者代价太高,因此本书采用的这种两段式处理方法,兼顾了模型构建的成本和效率,无疑是巧妙的。

另外,并购原本更多具有企业行为的特征,其微观效果变化的随机性较大,宏观经济影响的测度更加困难。事实上,并非任何外资并购的宏观经济影响都需考虑,只有具备产业级影响的并购才应该被列入考察范围,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具有更大的垄断副效应的外资并购才应该被加以控制。本书准确地把握了这一要求,它通过在模型中引入集中度指标,而将外资并购宏观影响的考量内生化的,这就克服了单纯用集中度作为判定外资并购宏观经济效果的缺陷,使得这一衡量方法和模型更加符合垄断判定的“行为主义”观点,从而为该模型的建立进一步夯实了理论基础。

第三,对内资并购、外资并购和 FDI 对东道国经济福利的影响,做出了首创性的、较为全面的比较。作为研究外资并购对东道国经济福利影响的课题,该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基本论证过程是,内外资并购有何不同,外资并购与 FDI 对东道国经济福利的影响又有何差异。在前一个问题上,本书的主要分析结论是,资本是无国界的,但控制资本的人是有清晰民族性的,因此内外资对一国的福利影响主要是长期利益的分配和补偿能力问题,内资并购后短期垄断福利损失在长期内存在部分甚至超额补偿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在外资并购后却是微乎其微的。另外,相对于内资并购而言,外资并购的增资效应一般较小,但技术进步促进效应总体上仍然显著,不过,由于外资的控制者最终会服从于其母国利益要求,因此,它对东道国的民族自尊心、产业竞争力和国家安全都会产生更大的冲击。

在 FDI 和跨国并购对东道国经济福利的影响差异方面,本书并没有采取当前多数文献中将外资并购用 FDI 数据直接替代的做法,而是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过渡关系。其主要研究结论是,相对于一般非控股 FDI,外资并购因其具有资金的杠杆效应,因此资本的输入效应较小,但因为外资并购实现了对东道国企业甚至产业的控制,所以对东道国影响的程度更高;外资更倾向于往被并购企业输入高新技术,但同时为维护其竞争地位又更容易对外技术封闭,因此相对于 FDI 而言,外资并购的直接技术输入效应高而技术外溢作用较小。虽然本书中只对三者的福利影响进行了定性比较,其结果的正确性还有待进一



步验证,但这种比较的分析逻辑大体是成立的。

第四,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清晰而简练。分析外资并购对东道国福利影响的一个关键目的,是要使其具有政策制定的辅助作用。目前各国对外资并购规制的政策实践,多基于两个理由和两种方法。一个理由是保护产业和国家安全,其政策实践多采用诸如安全事务委员会一事一议加以裁决的方法,来实现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另一个更具有普遍性的理由是遏制垄断和维护有效的市场竞争,其政策措施是采用反垄断法、竞争法或产业政策为外资并购设立制度性约束。表面上看,反垄断法、竞争法主要是基于一国总体福利的经济考虑,而国家安全政策则更多基于国防和国家基础安全的考虑,但两者在根本上其实是一致的,都是服从于维持一国长期竞争地位的目的。在外资并购对一国长期竞争力的影响方面,目前的理论研究和政策依据还多是源于局部均衡或还原论的分析方法,缺乏对外资并购的综合福利效果进行一次性全面评判的工具,而本书的研究是在这方面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总之,本书以独特的研究视角、思路和方法,在外资并购基础理论、外资并购的福利衡量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填补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空白,其研究的体系安排合理、研究思路清晰,内容充分体现了科学性和实用性的统一,所用资料和数据新颖、翔实,文字简练通畅,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用系统论方法提出外资并购规制标准的优秀著作。我非常愿意为本书作序,相信其出版能有力地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深化。

陈佳贵

2010年6月于北京

摘 要

21 世纪以来, 外资在华并购呈现出与以往不一样的特征: 外资对垄断产业中的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的并购数量明显增多, 在高资本和高技术密集度等产业呈现比较明显的系统性并购特点。这些产业通常与国防安全联系紧密, 或者在国家产业体系中处于关键地位, 产业关联度高、技术承载力强, 多为当前中国工业化阶段的核心力量。外资在这些产业的大规模并购, 极易威胁中国的国防安全, 动摇中国的产业协同, 危及中国的产业竞争力。尽管中国已经通过制定反垄断法、产业政策、外资行业进入指导目录等政策, 并成立了反垄断委员会、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等相应机构来规制外资在华并购, 但各机构的执行标准不统一, 各规制在原则和细节上还缺乏系统的协调。虽然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弱化了国外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能力, 但跨国并购已经是世界的潮流, 而中国产业的竞争力提升也并非一蹴而就, 一旦国际经济走出低谷, 外资在华并购的浪潮必将卷土重来, 中国必须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本书以中国产业竞争力、创新力和长期福利提升为根本出发点, 通过构建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福利影响的评估模型, 为中国制定和调整规制外资并购的政策提供了方法性支撑。全书分为 7 章, 第 1 章引言论证了课题研究的必要性和研究方法, 并对已有研究做了综述; 第 2、3 章分别对世界和中国跨国并购的历史、现状、特点、趋势及成因做了分析, 对外资在华并购的问题表象和实质进行了探讨; 第 4 章分析了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福利影响的主要方面, 比较了外资并购、内资并购和 FDI 对中国经济福利的



不同影响，为模型构建奠定了特征基础；第5章对系统模型及其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加以介绍；第6章就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福利影响评价模型的构建过程和方法做了详细说明，该模型由两部分组成：福利指标体系和CGE模型，CGE模型的构建采用了非完全竞争假设，并设计了区分内外资并购、FDI与外资并购差异的方法，该计算结果为计算福利指标提供了数据支撑；第7章用所建模型进行了冲击实验并说明了其政策含义。由于具体外资并购的行为差异很大，其显性福利反映也各不相同，尽管本书的冲击实验更多体现了方法论意义，但由于模型方法具有普适性，所以仍然便于在政策制定中应用。

目 录

1 引言	1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
1.2 文献综述	5
1.3 研究的主要方法和内容	10
2 国际跨国并购大发展的趋势和特点	13
2.1 跨国并购的内涵、分类及特点	13
2.2 跨国并购的发展历程	17
2.3 跨国并购的特征和趋势	20
2.4 跨国并购发展的原因和条件	34
2.5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对跨国并购的影响	42
3 外资在华并购的特点、趋势和问题	46
3.1 外资在华并购的趋势	46
3.2 外资在华并购的特点	54
3.3 外资在华并购的诱因和条件	59
3.4 外资在华并购的问题实质	66
4 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福利的影响方面	81
4.1 经济福利的定义	81
4.2 跨国并购对东道国经济福利影响的国外研究	84
4.3 外资在华并购对中国经济福利影响的文献综述	89



4.4 外资并购与内资并购、FDI 对中国经济福利影响的差异	98
5 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福利影响的分析方法论	109
5.1 跨国并购福利分析的方法论	109
5.2 一般均衡与可计算一般均衡	118
6 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福利影响的评估模型的构建	134
6.1 模型解决方案的基本思路	134
6.2 福利指标体系的构建	136
6.3 CGE 模型的构建	139
6.4 CGE 模型的数据基础	157
6.5 外资并购影响的变量的估计	176
7 外资并购模型的冲击实验及其政策含义	177
7.1 外资并购模型的强壮性测试	178
7.2 外资并购模型的冲击实验	181
7.3 模拟冲击的政策含义	196
结语和展望	199
参考文献	201
后记	218

1 引 言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自 19 世纪以来,世界上已经发生了六次并购浪潮,而从 20 世纪 50~60 年代第三次并购浪潮开始,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日益掺杂,并购浪潮向跨国并购浪潮演化。换句话说,时至今日,世界上总共发生了四次跨国并购浪潮:第一次发生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这是跨国并购的起步阶段。第二次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峰值在 80 年代末,它是跨国并购的发展阶段,也是跨国并购真正开始形成像样规模的阶段。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当属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第三次和发生在 21 世纪初的第四次浪潮,这两次浪潮是迄今为止跨国并购的相对高潮阶段,也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真正的跨国并购浪潮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今的约 20 年时间。在这 20 年里,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除了 1992 年、1993 年国际直接投资中绿地投资比重略高外,其余年份跨国并购在 FDI 中的比例都超过 50%,最高的 2005 年甚至高达 95.48%。跨国并购额 1998 年为 1156.23 亿美元,2000 年第三次浪潮的高峰阶段上升到 11438.16 亿美元,2007 年第四次浪潮的高峰阶段达到 16371.07 亿美元,即使在 2008 年全球经济因金融风暴而有所衰退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在 11247.79 亿美元的高位水平。可见,跨国并购不仅已经成为 FDI 的绝对主要方式,而且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资并购也呈现出巨大的增长势头,1998年中国跨国并购销售额不过800万美元,1999年相对高峰阶段也不过23.95亿美元,而到最近一次高峰的2007年则达到155.37亿美元,可以说2002年以后几乎是爆发式的增长,即使在2008年下降了55.62%的情况下,其68.96亿美元的绝对数额也仍然使其成为中国的第四大外资并购年。虽然外资并购占流入中国FDI的比重还远低于世界水平,但同样有着很高的增长势头。1990年只有0.23%,2002年前也不过2%~6%的水平,而此后一路猛涨,到2007年时已经达到18.6%。2008年由于中国的政策限制突然加强,其比例也应声回落到6.37%的水平。不过,总体看来,在中国持续向好的经济发展势头面前,国内市场形成了对外资强大的吸引力,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一枝独秀的表现使其成为世界投资的“避风港”。跨国并购与世界经济的形势其实并非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所以,即使在未来世界经济难以快速复苏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允许,外资的在华并购也可能保持一个相对活跃的状态。

在迅猛的外资并购发展势头面前,国内对外资并购现象出现了支持开放论和产业保护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争论的焦点是外资并购是否对国家的经济安全,尤其是产业安全构成了威胁。王志乐(2007)认为,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一个重要的方面军,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合作竞争最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在与外资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应当更多地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且从所掌握的资料分析,中国正处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罗晓白(2006)、方宁(2006)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对当前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问题夸大外资并购的不利影响,也不必过于敏感和政治化,更不能通过封闭市场来阻断外资并购。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行业真正被外资垄断,一个外资企业也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对中国某个产业的垄断,不能在防止外资垄断的同时导致国有资产垄断。对此,桑百川(2006)、刘彦鑫(2007)等一批学者也持有相似的观点。

然而,金萍(2007)认为,跨国并购是把“双刃剑”,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影响东道国的包括资源安全问题、金融安全问题、产业安全问题和制度安全问题等在内的经济安全。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披露的一份研究报告称(郇丽,2006),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我国的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拥



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包括机械、电子等装备制造业在内的多个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 1/3 以上的市场份额（决策与信息，2006）。一些跨国公司或投资基金在华并购有“三个必须”：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 15%。这一被称为外资并购的“斩首”行动，正表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如果真的丧失了对中国关键产业和企业的自我控制权，中国好不容易在自主创新战略引导下建立起的自主创新体系和知识产权体系必将惨遭破坏（相晓冬，2006），企业和产业利益也终将受到剥夺或干脆丧失。有鉴于此，邢厚媛（2007）认为，虽然我们不提倡狭隘的民族主义，但不制定和利用好并购的规则，开放带来的就不仅仅是风险，而是损失。美国是全球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又是对外投资大国，也是国家安全意识最强的国家，在外资并购问题上的国家安全范围最为宽泛。李炳炎（2007）认为，当今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经济安全问题，美国对此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到了 90 年代，克林顿将经济安全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目标之一；日本的经济计划厅在 70 年代成立了日本经济安全特别领导小组，其主旨是以经济手段为中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俄罗斯也制定了保证经济安全的相关法律，并于 1996 年提出了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中国对自己的产业加以保护是理所当然的。程恩富（2007）等人也认为，如果任由外资并购按目前大规模、系统性趋势发展下去，我国数十年积累的全部民族工业基础将被外资控制，我国的民族工业必将彻底沦为外国资本的附庸。

从政策实践方面看，中国在应对外资并购所带来的产业安全问题上的政策措施大多为近两三年来匆匆出台的，理论依据不足，风险防范的力度还很薄弱。两次出台的外商投资指导目录立意于鼓励 FDI，其规定不具体，法律级次低，对风险防范的作用相当有限。虽然，商务部等部门通过成立产业损害调查局，旨在从贸易方面加强对产业安全的保护，不过由于是单部门的运作措施，又处于探索阶段，效果并不理想。2005 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对“大型重点骨干装备制造企业控股权向外资转让时应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仅是一种程序规定，并未给出具体的实施细则。2006 年 9 月，由商务部、国资委等 6 个部门联合发布并实施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是中国针对外资并购国内各行业排头兵企业的一



项非常直接而有效的应对政策（李微，2006）。不过，这些特保措施的运行标准尚没有明确的依据。虽然目前商务部成立了反垄断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成立了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国家发改委也发布了《反价格垄断规定》，专司对“经营者集中”的垄断审查，但还不能就产业竞争状况的变化做出灵活的调整，其审查和执法的依据还缺乏一个较为系统而科学的标准。

从理论研究方面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利用外资和国家经济与产业安全问题上曾有过三次集中争论（决策与信息，2006）。由于当时中国的开放程度还不是很高，开放的领域还不是太敏感，产业和经济安全问题并不十分突出，外资并购对产业安全的影响在理论研究上很不充分。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2005 年推出的“开放环境中的国家经济安全”课题研究报告（经济观察报，2006）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有关产业安全领域最权威的理论研究成果（中国经济时报，2007），它虽然较全面地讨论了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概念，但没有对外资并购带来的产业安全问题给出系统的解决方案。此外，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的“外资并购与产业安全”研究课题虽然提出了一些产业安全防范的措施建议（邹静娜，2007），但仍然没有在对哪些产业的安全问题应该予以更高度的重视方面给出系统的评判标准。2008 年以后随着外资在中国并购强度的减弱，外资在华并购问题似乎逐渐远离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但事实上只要中国的企业和产业竞争力没有提高到与国外发达国家的企业和产业相抗衡的高度，中国的开放趋势没有变化，那么外资并购问题就总是存在，而且极有可能随时变得越来越严重。中国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亚洲国家的跨国并购增长比较平缓，而中国的外资并购在 2002 年后出现爆发式增长，其增长特性与发达国家类似，这说明中国的外资并购问题受到发达国家并购能力的强烈影响，一旦世界经济实质性复苏，中国的外资并购问题就将卷土重来。中国必须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

综合来看，中国在外资并购问题上的争论焦点表面上看是产业安全问题，实质是对以并购方式利用外资长期利弊得失的衡量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在外资并购对国民经济宏观经济影响方面，理论上的探讨还极不充分，这无疑会弱化中国相应产业政策的执行效能。而本书所希望建立的衡量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福利影响的综合评估框架和模型，对中国尽快建立一套既能对经济安



全进行有效防范,又能保障产业竞争提升方法,提供基础性的客观依据。

1.2 文献综述

迄今为止,衡量外资并购对东道国经济福利综合影响的研究尚属空白,但学术界在此方向上的研究可以说非常踊跃,只不过当前的研究主要还是从还原论的角度,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展开的,真正系统的研究还不多见。另外,由于国内外资并购的相关数据还比较缺乏系统性,统计的时间较短,因此很多外资并购的文献都是以外商直接投资(FDI)^①为研究背景的,不过由于跨国并购是国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多数特征相同,因此这样的替代多数情况下是合适的。

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福利影响的评估框架和模型研究,根本上讲是经济福利的测度问题,然而在对一国经济福利是否可以测度方面,一直存在争议(杨缅昆,2006)。产生这种争议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对经济福利的概念理解还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经济学流派对福利的内涵远未形成共识。大体上说,可以把福利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经济福利概念由于更强调经济因素,并倾向于用诸如国民收入、社会福利函数等福利的“客观对应物”来衡量人们的满足程度,因此其可测度性较高。但如果把个体心理、资源、能力、外部环境、可持续发展等诸多与福利有关的各个方面扩展进来,由于其中包含着更多的“幸福”、“快乐”等成分,其不可测量性大大增加。不过,这样的福利其实更应该属于广义范畴的社会福利概念。第二,经济福利衡量的基础假设还没有完全调和。其基本反映是旧福利经济学中可衡量的基数效用论和新福利经济学不可横向比较的序数效用论之间的争论(郭伟和,2001;孙月平,2001),尽管这一争论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日益调和的趋势(姚明霞,2001),但两者的融合还远不充分。第三,关于测量计算方法问题尚未

^① 为方便叙述,本书以下将国外直接投资简称为“外资”,由于本书不涉及国际间接投资,这样的简称不至于导致概念混淆。



得到很好地解决。福利测度的典型方法是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对国民经济层面的福利分析,一般均衡体现出更大的优越性,然而要把一般均衡由抽象的经济描述转变为实用的经济分析工具,由于其方程的非线性和方程组规模较大,模型求解算法并不容易(李彤,2000)。

鉴于上述原因,尽管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的福利影响问题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但真正有影响的文献却高度缺位。目前与该主题相关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基础性纯理论研究。(外资)企业并购对一国福利影响的一般性理论文献很多(Tarun, 1999; Reis, 2001),虽然这些文献大多并非采用系统论的分析方法,但其研究成果仍然可以对外资在华并购的福利分析研究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例如,关涛(2004)通过构建三国寡占行业模型对国际竞争条件下并购的效应进行了考察,从而得出并购所引起的出口竞争对手之间的正国际溢出效应足以给没有参与并购的企业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搭便车”效应的存在又会使国内并购的好处耗费殆尽的结论;胡峰(2003)通过一个简单的同质商品市场的古诺模型说明,由于净进(出)口国一般倾向于反对对他国具有正(负)外部效应的并购,因此考虑到我国有很多产业目前均处于净出口国地位,政府应该鼓励净出口产业国内企业间的并购,而对外资并购中国内地企业,则应该在至少不减少本国福利的情况下才予以批准。这些基础性理论研究虽然为一国外资并购的福利评价提供了一定的分析依据,但由于其模型条件苛刻,尚未进入可实证的阶段,更谈不上依此建立可计量的模型。

第二,跨国并购效应的数量实证。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福利的影响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目前的大量文献主要集中于就业、工资、资本形成、技术效应、贸易五个视角。

在跨国并购对我国就业影响方面,实证分析结果基本形成了促进论、阻滞论和不确定论三种观点。例如,吴扬(2004)认为,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主要是为了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因而有助于吸纳国内的劳动力;汤玉梅(2008)认为,从数量上看,外资既会通过增加新的生产能力而产生直接就业创造效应,也可以通过带动前后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间接就业创造效应;刘继林(2005)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外资的大规模流入并没有给我国就